



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
亚洲与世界研究丛书

东亚模式的启示

——亚洲四小龙政治经济发展研究

王健勋



中财 B0032162

北大中国国情研究中心 《国情与世界》研究丛书

东亚模式的启示

——亚洲四小龙政治经济发展研究

〔美〕弗里德里克·C·戴约等著

王浦劬 译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书章

总号 405451

书号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京)新登字 097 号

东亚模式的启示

——亚洲四小龙政治经济发展研究

〔美〕弗里德里克·C·戴约等著

王浦劬 译

*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 100866)

朝阳第一教师进修学校胶印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 9 印张 218(千)字

1992 年 11 月第 1 版 199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000 册 定价: 5.55 元

ISBN 7-5043-1983-X / F · 106

《国情与世界》研究丛书编委会

顾问 费孝通 陈岱孙 季羨林
陈守一 宫达非 姜殿铭
主 编 赵宝煦
副主编 罗荣渠 刘升平
乐黛云 张品兴
姚礼明(常务)
编 委 阎步克 俞可平 王浦劬
朱善利 陶 凯 宗 义
刘 明 时宪民 潘银杰
潘 祎 夏 勇

原书名:《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Asia Industrialism》

根据美国康奈尔大学出版社(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年英文版译出

《国情与世界》丛书前言

国情研究是一项基础性研究。在改革、开放日益深入的今天，准确地把握我们的基本国情，更是一项紧迫的重要任务。为了推动对国情的深入研究，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丛书。

国情研究纷繁复杂，千头万绪。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研究中国国情，必须与外部世界参照比较。只有这样，才能深切了解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借鉴别国有益的经验教训，进一步理清中国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发展线索。本丛书以反映我国学术界关于中国国情与世界研究的最新成果为主，适当吸收国外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有价值的有关新论著。我们希望本丛书能为研究工作者提供参考，为决策人员提供理论和现实的依据，为一般读者了解中国国情提供帮助。

本丛书凝聚着我们的心血和期望，热切希望得到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关心、理解和支持。

《国情与世界》研究丛书编委员

1992.8.11 于北京

前 言

在过去二十年间，东亚新兴工业国家（地区）——南朝鲜、台湾、新加坡和香港——经济增长极为迅速，伴随着这种增长的是一种积极的模式，即收入均等，低失业率，基本上消除了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所存在的贫困。最引人注目的是，这样的“经济奇迹”发生在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匮乏的几个小国和地区。

以轻工业产品出口为基础的东亚经济的增长，常常被人们用来证明发展的传统理论，这种传统理论强调贸易自由化、私人企业和有限的政府经济作用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近来，许多研究者都对政府在发展中仅仅起着间接而微弱的作用的观点表示怀疑。人们逐渐认识到，至少在新加坡、南朝鲜和台湾，全面的政府干预在近年来的经济重构中的作用极为突出。本书旨在通过对政府在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的某种程度的探讨，以找到更加符合东亚经济增长的真正原因。

就所讨论的政府作用来说，人们的注意力历来集中于政府在引导内部发展和管理外部经济关系方面所作的经济干预上，而对于东亚政府有效地实施始终如一的发展战略的独特能力的社会政治和制度基础，却极少关注。这种能力植根于外部政治联盟、内部集权统治和有效的经济制度之中。本书的第二个目标是弄清政府对于市场的有效干预的这些社会政治基础。

与外部资本、市场和技术的联系对于内部增长的明显的积极作用，看来更多地现代化理论而不是依附理论的观点提供了证据。因此，对于东亚经验的社会政治方面的讨论并不一般地涉及依附论所提出的理论问题。本书的第三个目的是提出与东亚发展的实际相符的理论解释，作者们从现代化理论和依附理论的不同角度提出这种理论解释，经过相应的批评性评价，为进一步

的理论阐述提供了基础。

本书得益于许多人的帮助、建议和支持，这其中，尤其应该感谢理查德·艾布拉姆斯、加里·格伦菲、珍妮·巴拉芙、罗伯特·斯诺和格·厄尔曼等学者的支持。同时，感谢本丛书^①的编辑皮特·卡岑施泰因先生，当初，是他促使我们编辑一部包括现有作者观点的论集。最后，谨向本书责任编辑罗杰·海登致谢，向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世界和平基金会及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东亚研究中心表示谢意，承蒙他们的允诺，我们才得以重印布赖斯·卡明斯和查默斯·约翰逊所撰写的章节。

弗里德里克·C·戴约
于纽约

①本书为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系列丛书中的一部——译注。

导 论

弗里德里克·C·戴约

七十年代东亚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台湾、香港、新加坡和南朝鲜）的持续高速经济发展与大多数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与高速的工业增长联系在一起的较为均等的收入分配，虽然在发展经济学文献中，东亚“经济奇迹”已引起了许多人关注，可是，它基本上还是停留在为人们熟知的探讨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经济发展的社会政治原因的理论争论之外。本书力图通过考察东亚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增长的社会制度和政治方面的原因，促使东亚的工业化经验较为完整地汇入发展理论的主流中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六十年代初，谈到第三世界的经济前景时，学术理论都以乐观主义为其主要特征。作为世界超级强国，美国成为下列普遍看法的发源地，即（美国）资本、发展援助、文化价值及政治、经济制度的扩散将启动经济发展过程，因此也将防止共产主义革命。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的著述中，这种正统说法得到了系统化和经典化，这些经济学家强调依赖国内和国际市场所带来的好处。在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某些制度经济学家中，这种流行的正统观念在含糊不清的所谓现代化理论中找到了栖身地。现代化问题的著作家们在学科重点、分析层次及理论模式方面迥然相异，可是，他们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却确实具有若干共同的广泛设想，这些设想对于本书尤其重要。这其中的一种看法认为，与发达工业社会的国家、企业、市场、发展资源，尤其是资本和技术的国际联系，从发展的意义上说，具有积极的长期作用，这其中包括经济部门中的自我维持和相互促进。这种设想

与新古典主义制度相对应，强调以市场力量为基础的对外经济政策的作用。第二种设想断定，虽然在发展经济中，这种外部联系可能起着重要作用，可是，自我维持增长的主要决定性因素还是在于发展中国家本身。一旦扩散清除了对于发展的传统障碍，增长就会不断进行。第三种设想是，从长远来看，经济发展不仅会促进一个不断改进教育和中产阶级逐步成长的社会中民主参与的扩展，而且会促进经济利益向着更为广泛的人民扩展。

在许多观察家看来，六十年代的联合国发展十年为这种发展的正统设想提供了支持。虽然美国的发展援助持续不断，跨国公司的直接对外投资水平节节升高，可是，工业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经济鸿沟仍然不断扩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增长部门并没有促进更加全面的发展，民主难以生根，收入不均日甚一日，发展的经济政治危机使早期对于社会稳定的希望化为泡影。发展研究的学者们所作出的反应各不相同。有人认为，政府应承担更大的经济角色，克服增长的制度和障碍，或以国营企业强化软弱的企业责任。另一些人更信奉具有公平政策的增长，这些政策有如考虑增长本身一样，优先考虑农业和一体化的农村发展，工作机会的形成，基本需求的满足。尤其突出的是，现代化的理论家认为，增长的关键在于强有力的发展政府，这种看法是与美国国际开发署代表团对于创立政府计划机制的不断强调同步发展的。S·亨廷顿最有力地陈述了这一看法，他认为：“在官僚政体中，需要权力的集中来发挥……政府进行社会现代化改革的能力。”^①

对于传统看法的这种种悖逆，标志着越来越多的知识性醒悟。与此同时，较为新颖、也较为悲观的观点在表明自己的存

① 亨廷顿，塞缪尔《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68年版第167页。

和权利，作为其中之一-的依附理论尤其重要。它发端于拉丁美洲学者，这些学者力图使民族经济摆脱先进工业国家。它也起源于那些论述帝国主义的新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家们之中。虽然他们在较为广泛的理论方法上很不相同，可是，这两部分作者都一致认为，一个正在发展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地带和中心地带（即第三世界和已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所造成的是边缘地带中的剥削和经济停滞而不是增长。这种想法代表着六十年代产生的依附观点。冒着过分简单的风险，我们可以鉴别那些遵循这一传统的著作家们公认的三个主要原则。

第一，第三世界国家经济被纳入扩大了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促成了农业生产或原材料交易出口的专门化，也促成了这些主要出口部门和外国资本及市场之间的协调性联系。

第二，虽然这种纳入带来了短期发展（因为初期的生产和雇佣利润得到了实现），可是，从长远看，持续依赖中心地区的市场、资本和技术会造成抑制发展的力量。以原料进口和制成品出口为主的贸易模式会造成边缘经济恶化和不利的贸易地位。面向中心地区市场的生产和对于中心地区技术、资本及生产要素输入的经常性依赖，会造成国内经济结构性畸变，这种畸变反映了外部经济联系对于内部经济联系的统治，并使这种统治得以永恒存在。这种畸变还阻碍了工业的多样化和生机勃勃的外向部门对于其他经济部门的刺激。与这样的飞快地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是从这种发展模式受益并力图保持这种模式的社会集团和阶级的出现。这个集团包括工资相对较高的工人、一小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以及政府官僚。最后，对于中心地区的资本和技术的依赖，尤其是直接的外国投资和外援，促成了外国利益对于国内企业和政府部门经济决策的渗透。因此，经济决策势必要反映外国政府和资本的利益，而可能忽视民族发展的内容。此外，对外国资本和技术的依赖意味着利润通过返还、特许费、特权、利益支付、

变动价格以及其他使经济剩余价值转移到中心企业的机制而外流。

第三，依附对于经济质量有不利的影响。跨民族、跨国家、跨政府的机构间接地促成了能够按照资本积累的利息控制工会、限制工资和大众消费水平的强有力的政权。跨国公司还运用中心国家发明的资本密集技术，造成一小部分工人的高工资雇佣，而对其他大多数工人则低薪雇佣。此外，飞地的发展与严重的地区和部门的不平等是联系在一起的。

如果说新古典和现代化的正统学说已经引导了美国和其他中心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发展援助计划，那么，依附理论则在若干拉丁美洲国家的早期发展战略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三十年代的世界萧条，使得以原料出口为基础的发展战略的经济弱点和不稳定变得十分清楚。世界市场的崩溃显然需要政府发起的经济多样化，尤其要使经济成为制造业。这一重要教训后来被延伸到用于保护和扶持国内工业的进口限制、关税、通货重估及其他政策措施上。在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这三个拉丁美洲主要新兴工业化国家（或称“NICS”），这种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得到了最强有力的实施。

依附理论对于理解古典的依附还是有用的。可是，很显然，需要重新考虑新兴工业国家的经济动力问题。作为对这种需求的反应，一种较新的知识传统在发展，这一传统特别集中体现在费尔南多·卡多索和恩佐·法莱图的著述中。与较为宿命的依附理论不同，这种“依附发展”学派承认在依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较为复杂的、非必然性的关系。它的修正主义的著作家们力图弄清国内外集团、阶级和组织的相互作用是怎样影响发展的。对于依附的不同状况的分析，允许对依附的社会政治背景加以阐述，这种背景本身决定了增长的可能性、性质和速度。比如，古典依附状况是，外国控制的农业或矿业领地是主导经济部门，它们促

成了长期的经济畸变。相反，在强有力的政府与国内工业化战略（既服务于跨国公司的利益，也服务于本地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谐一致的地方，多样化的经济增长得到了促进。

重要的在于，尽管依附理论的这种不太具有宿命色彩的变种促进了对于经济增长的一种经验上更具开放性的研究，可是，对于传统的依附理论的几个关键设想来说，它仍然是墨守成规的。依附的事实仍然被看作基本上是受到抑制的发展战略和成功。在皮特·埃文斯关于巴西的讨论中，发展的外部限制谈得很清楚：“依附发展只有从较大的帝国主义体系中获得支持才能存活。要知道依附发展是否总体上成功，必须根据跨国公司的投资意愿和国际银行家们扩大信贷的意愿”，“与古典依附相同，依附发展最终将达到其极限……，如果没有其来自中心国家的联盟，巴西模式是不可能存活的。”^①越来越多的政治不满，尤其是遭到排斥的那部分民族资本家的这种不满，体现了对于持续依附发展的第二个政治限制。

两种依附论的共同点在于都认为，依附是与时俱增的自我强化，它体现为进一步严重的经济结构混乱、决策渗透及依附阶级的出现，这样的发展势必是政治上排他性的，经济上不均等的。这样的看法主要来源于对于拉丁美洲新兴工业国家迅速工业化的研究。在那儿，工业扩展与不断增强的跨国渗透是同步发展的。这种扩展的结果是迅速的、但高度不均等的增长，是六十年代被迫接受压迫性政权。这一政权的作用在于保护外国和国内资本的利益，减少人民大众对于资本积累和政治稳定的威胁，抑制由前所未有的不均等发展引起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紧张。

拉丁美洲新兴工业国家迫使人们重新考虑依附问题，东亚新兴工业国家（地区）提出了一个甚至更具有根本性的挑战。在这

①埃文斯，皮特《依附发展》329页。

些国家和地区，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增长所凭藉的基本上是为世界市场生产劳动密集型的工业产品。比起拉丁美洲新兴工业国家来，这些国家和地区必然贯彻更为开放的、建立在贸易基础上的发展战略，而直接的外国投资水平并不如拉丁美洲国家那样高。可是，一方面，迅速而持久的东亚发展是与早期高水平的外援分不开的；另一方面，这种发展与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紧密相关。东亚的特征在于，引导依附发展的强有力的发展政府实施的集权统治。尽管如此，这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在几个方面是不符合于依附理论的。其中特别重要的是那种通过战略和经济结构的决定性转变、较为充分的就业、实际工资的不断增长以及经济不均等水平的降低，来适应变化着的外部环境的发展挑战的能力。这些不同之处使得某些研究者求助于正统方法来解释东亚的发展。贝拉·贝拉萨在重新确证开放的、市场取向的经济增长战略的新古典主义优越性方面特别有影响。可是，人们已经逐渐意识到国家干预在对外经济关系和对内经济事务中的作用，这就使得另一些研究者进一步探讨它对于强有力的发展政府所实施的战略的越来越大的影响。本书的撰写者们尽管对于依附理论的看法迥然有异，可是，他们都属于后一种人，即主张中央统制经济的传统。

东亚发展：政府战略的作用

发展的文献揭示了政府经济干预成为增长的关键性要素的历史和发展条件。其中包括：经济的落后或发展迟缓，增长的初级出口阶段的完结或失败，扶持进口替代工业的需求，对于企业家或投资的文化或社会障碍，诸如飞地发展或国内经济缺乏联系之类的经济结构错乱，关键经济部门的跨国控制，加上其保守势力必然被打破的根深蒂固的反对集团。此外，在那些以重工业或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增长作为发展基础的地方，尤其是五十年

代以来的拉丁美洲新兴工业国家和七十年代以来的东亚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战略性干预可能是重要的。在那些变化着的经济条件使经济结构和外部经济关系中的变化成为必然的地方，战略性指导的发展可能也是必要的。

当然，在此不可能对这些和其他一些条件加以充分论述。可是，很显然，比起中心国家发展的相应阶段来，后来的第三世界发展中所遇到的政治经济上无能为力的状况要相对大一些。这种状况体现了政府干预主义者的方案与当前第三世界的不发达问题之间的特殊相关性。除了个别国家和地区之外，1945年以来，第三世界国家一直力图通过或多或少的总体增长战略来加速经济发展。但是，除了这种基本前提之外，还必须澄清一些重要的区别：第一，这种战略防止了政策措施之间连贯性中的不断变化。有些战略只不过是集团、组织和阶级之间竞争的、不连贯的、变动不定的和偶然的政治结果。第二，战略仅仅是些模糊的看法，比起发展的需求来，它们更多地受着政治合法性和稳定的需求的支配。在精英人物缺乏对发展的信奉或害怕反对派即刻代替其政治地位的地方，发展战略就会反映短期的政治需求而不是长期的经济需求。第三，也许最成问题的，是效应问题。对经济发展所作的回顾和以战略为核心的阐述必须假设或证明实际战略。很显然，表面上与实际经济结果相一致的战略的存在本身并不证明战略与实施之间的因果关系。战略有时追随而不是领先于经济趋势。比如，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即具有特定工业化政策的早期经验促进了进口替代工业化之后，拉丁美洲进口替代工业化才被充分表述为一种战略。此外，政府有时也建构一些战略来“说明”政府行为造成的经济成功，从而力图使自身合法化。

最后，存在着政府与战略之间的关系问题。观察家们常常把增长战略与政府干预联系在一起。可是，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些状况即非政府精英，尤其是在亚国家层次上（或者如同香港那

样，在精英统一和经济集中化允许的地方)，在制定和贯彻发展战略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同样很显然，要在资本主义发展战略中政府和非政府精英复杂的相互作用之间加以区别，是很困难的。在此，我仅仅在政府指导(State-led)和政府引导(State-induced)的战略之间作一简单的区别。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政府指导战略必然使政府部门对于私人经济部门的决策和市场交易进行不断的选择性干预，以实现战略目标。另一方面，政府引导而不是政府指导的战略，强调私人部门在政府用来推进其择定的发展目标的广阔政治、法律、基础结构 and 经济框架内实施战略的作用。在拉丁美洲，这种基本区别足以把政府指导的、进口替代的工业重构时期与建立在政府强制基础上的经济自由化（如七十年代中期的智利）中的政府引导的、新保守主义的经历区别开来。

本书的若干章节指出了南朝鲜、台湾和新加坡一贯的发展政府指导战略对于经济增长和经济重构的重要性。他们考察了促进战略形成的较为广阔的社会政治背景，探究了国家指导的工业化怎样转而影响到了社会。最后，他们探讨了对外经济和政治联系对于国内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第一章，理查德·巴雷特和秦叔明比较了东亚地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而勾勒了这一地区发展的大致轮廓。他们发现，香港、新加坡、台湾和南朝鲜全都证明了一种独特的发展模式，即通过少数几个战略出口工业中的发展，促进其他工业中的增长和更多的就业。东亚的工业化出乎那些遵循依附传统的著作家们的意料之外。那些著作家们认为，对外经济依附造成的将是长期的经济萧条和经济不平等，是经济重构和发展战略制订过程中经济自主权的丧失和国内政府的弱化。相反，东亚新兴工业国家（地区）不仅代表了一种持续高速增长的模式，而且代表了一种相对平等的发展模式，代表了一种改变国内经济结构和世界市场地位以适应变化的外部环境的持续能力，代表了一种强化而不是

取消了的动员和调度经济资源的政府权力。这些作者结论认为，对于东亚经济成功的理解，需要一种中间地带发展理论，这种理论能够说明这些开放的、高度增长的经济中的政府和企业是如何成功地适应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变化的经济环境的。

布鲁斯·卡明斯在先是日本、后是美国称霸的较为广阔的背景上，探讨了东亚工业化的历史渊源，进而对于这种中间地带理论进行了研究。卡明斯认为，理解经济动力的关键是以重商主义政策为杠杆，使民族经济进入世界经济的较高地位的强有力的政府。在台湾与南朝鲜，发展主义的强有力政府产生的关键是日本殖民地政府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视，支配这种经济增长的是宗主国、新重商主义地区发展政策和延缓了人民党人向殖民统治发起挑战的极权政体。在日本统治下，大量的工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为后来的工业增长提供了基础。战后的美国霸权，促成了一个新兴的、以日本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区域经济中发展主义的、极权的、反共产主义的政府的出现。有组织的反对派和劳工遭到了控制。和战前的殖民主义相类似，这种战后的监护式控制在一个地缘政治意义上重要的地区中，促进了使经济稳定的工业和发展政策。而且如同日本一样，工业政策是通过政府——企业之间的紧密联系来贯彻的。最后，卡明斯指出了不断增强的对外自主权的重要性。在七十年代，这些政府开始采用新的经济重构政策，尽管它们缺少来自中心国家的支持。

这些论文指出，亚洲经济增长所依靠的是来自中心国家的贸易、资本和技术。依附著作家们认为，作为外国控制和内部经济强制工具的直接外国投资是十分重要的。在第三章，斯蒂芬·哈格德和陈国金比较了渗透于亚洲和拉丁美洲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中的外国资本的作用和形式，并比较了外国企业和国内（地区内）政府及本地企业之间的变化的关系。人们常常认为，跨国公司支配着这些亚洲经济，可是，哈格德和陈指出，除了新加坡之

外，这些公司在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地区）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如它们在工业化的拉丁美洲国家中那样广泛。就长期的发展来说，而且就避免对于外国资本的依附所产生的经常性不利地位来说，更重要的是亚洲政府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够支配和限制外国资本在本地经济中的作用，其发展计划在经济增长中起着关键作用。在七十年代重构时期，政府在发展中的作用逐步加强。而政府的战略力量，一方面依赖于与国内工业的政治联盟的形成，另一方面则依靠对于左翼分子的毁灭性打击和对于有组织的劳工和其他群众组织力量的剥夺。

查默斯·约翰逊和哈根·库进一步研究了哈格德和陈提出的这两个课题。第一个课题与有效政府政策实施的制度基础有关。第二个课题涉及到强有力的、有自主权的、发展主义的政府。通过对日本、南朝鲜、台湾政府指导的发展的比较，约翰逊认为，东亚资本主义国家（地区）的政府干预，依靠的是与政治绝缘的政府发展部门与主要的私人部门企业之间的组织和制度上的联系。通过对于贷款、出口许可、对外贸易等途径的控制，公共部门可以按照变化的战略目标系统地调节经济刺激。干预的效率同样也是通过促进支配战略经济部门的、与政府相关的强有力私营部门联合企业、银行及贸易组织来增强的。

第五章的重点并不是台湾和南朝鲜的排他性强有力政府的政策措施，而是这些政府的社会阶级和政治基础。库认为，日本的殖民统治损害了地主和其他社会阶级的力量和独立性，而这些地主和其他社会阶级在其他社会中恰恰渗透于政府结构之中。而且，日本的失败，是与外部政治经济关系的瓦解联系在一起的。其后，这些地区在美国统治的世界国家体系中的重新调整后，促成了强有力的极权政府出现于重新进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之前。库表明，这种影响在发展之初就促成了强有力的发展政府，从而形成了控制那些起初与外国投资联系在一起、后来又与新兴工业